

 學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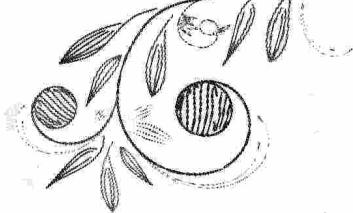
美学与艺术评论

复旦大学文艺学美学研究中心 编

第8辑



 學苑出版社



美学与艺术评论

复旦大学文艺学美学研究中心 编

第8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学与艺术评论. 第8辑, 新中国文艺理论60年回顾与
展望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复旦大学文艺学美学研究中心编.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5077-3645-8

I. ①美… II. ①复… III. ①美学—文集②艺术理论—文集 IV. ①B83-53②J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88537号

责任编辑: 杨 雷

封面设计: 北京鑫华印前科技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9

网 址: www.book001.com

电子邮箱: 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 010-67675512、67602949、67678944 (邮购)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三河灵山红旗印刷厂

开本尺寸: 710×960 1/16

印 张: 26.5

字 数: 420千字

版 次: 2010年9月第1版出版

印 次: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65.00元

目 录

试论当代文论话语建构三大路径各自的意义与局限	李春青 1
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人学理论与当代文艺学的建设	朱立元 5
析“文艺理论的危机”	王元骧 17
共和国叙事理论发展 60 年	赵炎秋 28
文艺美学学科 30 年建构的反思	吴家荣 桑 农 36
未完成的现代性与中国当代学术思潮	杨春时 45
问题意识的对话	
——中国巴赫金接受 30 年的回顾与反思	曾 军 55
对文学理论的学科本体和思想基础问题的反思	马龙潜 72
论哈贝马斯对审美领域的规范性建构及其限度	傅其林 78
试论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存在论根基	
——兼答董学文等先生	朱立元 90
“文学本质”新探	栗永清 110
文艺学范式：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的转换	李 勇 127
视像与当代文艺理论研究	程镇海 136
后殖民理论与当代中国文化批评	章 辉 146
现代性语境与当代中国文艺学的境遇	
——以建构主义与本质主义为核心	李 震 161
美：让人快乐、幸福	
——“人生论美学”刍议	王元骧 172
莱斯利·费德勒是谁？	陆 扬 181
“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和理论创新	程正民 190
胡经之文化美学研究的构想与理论意义	李 健 200
关于“艺术哲学”当下生存的思考	金丹元 210
美学的改变	
——从“感性”问题变异看文化研究对中国美学的意义	王德胜 219
关于转型时期审美文化研究与建设问题的思考	谢金良 223
新时期初“审美意识形态论”的生成肌理探析	刘锋杰 230
境界论：实践美学自我深化与现实关怀	刘旭光 239
现实主义与民族形式：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戏剧观念之内在	

冲突与妥协	黄 键 247
西方现代审美话语接受中的价值倾斜	王轻鸿 258
人文精神、体验、开放、交流	
——文学概论教学实践反思	刘慧妹 269
从想象论文学批评	李先国 274
日常生活如何审美化?	
——由鲍德里亚的“超美学”看日常生活审美化之争	汪德宁 287
论孔颖达对儒家诗学的演绎	乔东义 295
“通变”诗学转向中的崇正倾向	
——试论刘勰的通变观	杨 晖 310
论中古时期出处思想的演变及其审美意蕴	李昌舒 316
“典型”理论的坍塌与“写人学”的构建	李桂奎 326
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水意象	王顺娣 337
法国现代派小说理论的中国化	
——谈《现代小说技巧初探》	王洪岳 350
现代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文论的建构	危磊 360
论文学理论的功能极限	
——兼及30年文学理论研究与未来突破	赵建军 366
多民族多区域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理论	
——对新时期30年文学理论的一种反思	张永刚 377
海德格尔后期哲学的空间化转向及其对中国当代生态诗学、	
美学研究的启示	赵奎英 387
谈“文学概论”教材的三个转移	申载春 398
从“时间性”论“本质主义”文艺学的终结	刘彦顺 406
编后记	416

试论当代文论话语建构三大路径各自的意义与局限

李春青^①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已经走过了60个春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存在着很大的局限，也面临着严重的危机。总体来看，60年间，我们的文学理论是沿着三大研究路径推进的，这就是：追问真相的、意义建构的、反思的。下面我们就对这三大路径之得失分别予以剖析。

一、关于“追问真相”式的文论研究

“追问真相”式的文论研究是指那种预设了文学问题的客观性与可把握性的研究路向。这种研究路向的总体特征是坚信研究对象中隐含着某种根本性的属性，通过研究可以揭示这种属性，并因此完成对对象的彻底把握。这主要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

关于文学的定性问题。关于文学是什么的追问。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的形象化显现？个人无意识的改头换面？社会心理或集体无意识的感性呈现？等等。

关于文学创作的奥秘。文学是如何被创作出来的？创作心理机制，创作动机与创作冲动，情感、想象、直觉、灵感、天才的作用，等等。

关于文学的发展演变的规律。文学起源于何处？劳动、巫术、原始宗教、神话，等等。什么是文学发展的动力？经济原因、政治原因，社会心理、宗教，等等。文学发展的规律如何？进化论的？盛衰交替循环的？不平衡的？

这三大问题是几十年来我们的文学理论所热衷的。结果如何呢？事实证明了两点：

第一，上述问题都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确定的、单一的答案；而追问者的困境在于都各自预设了一个确定的答案。

第二，人们找到的答案不管是否具有合理性，都是毫无意义的——无论是对文学创作，还是对文学欣赏，都没有任何指导意义，即使从纯粹知识论的意义上看，这样的追问也只是在众多的解释中增加了一种而已，并不能证明它使关于文学的知识向着真理更靠近了一步。

^① 李春青，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负责人。

这里的问题在于,这种研究路向从一开始就把方向搞错了:“追问真相”是自然科学或工具理性的任务,对象是客观的自然存在物;对于文学这样典型的人文学科是没有真相可以追问的。科学实验、调查、统计、因果关系、三段论式的推理,在这里都不能解决问题。

二、关于“意义建构”式的文论研究

与“追问真相”式的文论研究不同,我们另一种研究路向是以“意义建构”为目的的,不求解释什么,但求确立什么。这种研究就其大的路向而言完全是站在正路上,因为人类创造出人文学科就是要解决意义问题的,是基于自我意识的。如果说意识具有外指性特征,主要是对人之外的客观存在的把握,那么自我意识就是指向人自身的,既是对个体人的,又是对作为整体的人类社会的把握。因此意识产生知识,是主体对客体的把握,的确具有一定程度的客观性(可验证性);自我意识则产生意义与价值,是主体对自身存在状态的觉察与判断,存在某种程度的共通性而不存在纯粹的客观性。

我们的文学理论在意义建构方面的表现主要有:

主流意识形态的专业化形式。国家政策、方针、一个时期的政治理念转变为文学理论术语与原则。

人文知识分子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审美、自由的象征、纯文学、精神家园、神圣性、批评性、超越性,等等。

个人颓废意识的显现。文学是文字游戏、茶余饭后的消遣,个体心灵的自我呈现。

这种意义建构之研究路向的问题在于:意义建构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坚实的、获得普遍认同的合理性基础。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意义建构才是有效的。所谓有效,是说这种意义建构看上去是那么回事,符合实际情况,有普遍和持久的可接受性。依此标准来看,上述三种情况都是有问题,都不足以构成真正有效的意义建构。问题有二:

第一,企图以某个社会集团或阶层的价值观为文学理论赋予普遍性,根本无视社会大众的立场与需求,无法真正获得普遍认同。

第二,这种意义建构借用了客观知识论的外衣,把自己打扮成真理的样子,缺乏沟通、互动的实践环节,因此只能是自说自话式的话语游戏。

三、关于“反思”式的文论研究

毫无疑问,“反思”式的研究路向是在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形成的。这种研究路向的基本特征是:不是就文学理论范围内的各种具体问题进行追问,而是向着文学理论本身发问,即对追问的追问,对研究的研究。这种研

究路向也有三种情况：

神话是如何形成的。文学理论常常制造神话，诸如：文学是自由的象征、文学可以拯救人的灵魂、文学是人类的精神家园，等等。这些神话都可归结为“审美乌托邦主义”的产物。“反思”式的研究路向旨在破除这些神话，并指出它们是如何以及为什么被制造出来的。

文学理论话语背后的政治话语。文学理论就整体而言并不是纯粹的客观知识系统，而是站在不同立场上的人们对文学的操控与理解。其中包含着深刻的政治性与意识形态性。“反思”式的研究路向试图揭示隐含在文学理论专业术语与命题背后的权力关系以及意识形态因素。

文学理论话语形成的文化历史语境以及背后的文化逻辑。在“反思”式的研究路向看来，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集体，知识分子作为言说者，都是某种社会结构的功能，要受制于具体的文学历史语境。一种文学理论观念、提法、核心命题都是这种功能的具体显现。因此，文学理论话语的形成就必然有一条隐含着的文化逻辑——由各种先在的思想资料与现实的社会需求构成的张力所导致的言说倾向（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在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应该承认，“反思”式的研究路向是深刻的，的确破除了许多神话，常常能够发人深省，就像一把犀利的解剖刀一样所向披靡。但其问题也是明显的：

第一，破坏的、颠覆的而非建构的。文学理论作为人文学科，并不是以追求真相为存在合法性之依据的。它的作用是具体的社会功能。有时制造神化是社会历史所需求的。

第二，无预设，无底线，可以无限“反思”下去，直至解构掉自我，而成为真正的精神分裂者。

第三，拒斥意义建构，不相信任何神圣、崇高之物，对一切都缺乏敬畏，违背人文精神。

四、探询新的出路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知道了当今文学理论的“三大研究路向”都存在着各自的问题与局限，那么文学理论的出路何在呢？

第一，“追问真相”依然是必要的，但是应该把“真相”理解为“有限普遍性”。也就是说要把研究的结论“语境化”或“条件化”。例如，对于“审美无功利”这样的命题，应该把它放到具体的文化历史语境中，联系提出者康德所代表的社会集团的理想与价值观来加以判断，指出它出现的历史必然性、适用范围与社会文化功能就可以了，而绝对不应该把它作为一个普遍真理来接受。

第二，“意义建构”同样是必要的，但是应该把“意义”理解为在一定阶

段上、一定范围内有效的价值，即“有限合理性”，而不能把它视为绝对的或者终极的价值。这里的“合理性”应该理解为基于大多数人基本经验或利益关怀的共同意见或评价标准。例如，“含蓄为美”是一个价值判断，凸现一种意义，我们在运用这个价值判断时应该明白它只是相对于某种文化传统才是合理的。因此作为一个价值判断，它不具备绝对的合理性。

第三，“反思”其实是任何一种真正的学术研究都必不可少的基本素质。因此“反思”式的研究路向同样具有存在的理由。但是“反思”也应该有基本立场，否则就难免会陷入相对主义或否定主义。问题是如何选择这个反思的“立场”。在这里或许有必要引进“对话”的机制——在没有任何形式的内外强制的情况下在“反思”者与被反思的对象之间展开有效的对话。这是哈贝马斯“交往理性”意义上的对话。这里有几个要点，一、充分尊重对象，把它视为一个平等的谈话者。二、把反思对象置于具体语境之中来考察其“有限普遍性”和“有限合理性”，然后再将其置于更大的语境中，考察其局限性。三、把对象在特定语境中的功能与其产生的文化历史逻辑区别开来。常常有这样的情形：某种文论主张产生于某种意识形态运作或政治策略，背后是尖锐的权力角逐，但在特定语境中却能够发挥积极的、无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其功能与生成逻辑有时并不一致。

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人学理论 与当代文艺学的建设

朱立元^①

在纪念改革开放 30 年之际，我国文艺界和文艺理论、批评界纷纷回顾、总结、反思 30 年的文艺经验和理论发展道路。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在我看来，这对于未来我国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批评的建设和发展都有着极为重要和迫切的现实意义。

笔者认为，这种回顾、总结、反思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思路加以展开。比如，就文艺理论而言，许多学者从审美性和意识形态性及其相互关系入手来探讨文学的本质，这固然不错，而且确实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但是，我们是否可以换一个角度、换一种思路，即以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为基础来阐述和揭示文学的本质的某些层次和方面呢？我想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就“文学是人学”这一根本之点而论有可能更加切近文学的本质。关于这一点，似可从两个方面加以考察：

一是从 30 年我国的文学发展实践来看。

毫无疑问，30 年来我国的文学创作取得了远远超过新中国前十七年的伟大成就。上世纪 80 年代从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到先锋文学，文学思潮此起彼伏，文学观念多元展开，文学景观多姿多彩，优秀作品大量涌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90 年代在市场经济逐步建立、商品大潮不断涌动的大背景下，文学的整体格局出现了雅俗大分化，世俗化、通俗化、大众化迅速成为主流，但同时，引领时代潮流的高品位佳作仍然不时涌现，守望和维护着人文精神；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全球化的大趋势和信息、传媒、网络时代的到来，随着我国现代化、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文学中物质化、欲望化、日常化、娱乐化倾向愈益彰显，但相反的精神抗争和审美抵御也从未终止，创作群体“70 前”和“80 后”的分野越来越明显，但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问题是，这 30 年中国文学有没有一以贯之的思想脉络？有没有始终不变的

^① 朱立元，复旦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学精神？我很赞同当代最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之一雷达先生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他在回顾30年文学发展的历程后作出如下的概括：这30年的中国文学，“寻找人、发现人、肯定人就是贯穿性的主线”；“事实上，寻找‘人’和回答‘人是什么’是新时期文学最根本的一个精神向度”；他还进一步把这一人学主线具体化为“对民族灵魂的发现和重铸”^①。我认为，雷达先生的这一概括是准确的、深刻的，完全符合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发展的实际。

无独有偶，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在回顾、总结自己30多年来学习东西文学经典、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经历时，也重点谈到了文学的人学本质。她将文学比喻为灯，认为“无论生活发生怎样的变化，无论我们的笔下是如何严酷的故事，文学最终还是应该去呼唤人类积极的美德”，“文学应该是有光亮的，如灯，照亮人性之美”；她还从普遍人性角度理解文学的本质，认为文学其实只需简单地分为两类，即“好的和不好的。而所有好的文学，不论是从一个岛，一座山，一个村子，一个小镇，一个人，一群人或者一座城市，一个国家出发，它都可以超越民族、地域、历史、文化和时间而抵达人心。也因此，我对文学的本质持乐观的态度”。这就是说，一切好的文学都应该超越国家、“民族、地域、历史、文化和时间”而通向普遍的人心和人性；所以，她坚定地表示，要“保持对人生和世界的惊异之情，和对人类命脉永不疲倦的摸索，以自己的文学实践去捍卫人类精神的健康和心灵的真正高贵”^②。这恰好是以作家个人亲身的创作体验呼应了雷达对新时期我国文学创作基本精神的人学概括。

上述两位作家或评论家的思想，我以为不谋而合地把文学（不仅仅是近30年的文学）的本质与人、人性、人心即与人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我想，这决不是巧合，而恰恰是从一个特定角度对文学的人学本质的有力揭示。

二是从30年我国文学理论的发展状况来看。

与文学创作思潮的演进密切相关，30年来文艺理论也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和发展。由于涉及的问题非常多，这里只就文学与人学的关系角度作一简要的回溯。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全民性思想解放运动蓬勃兴起的社会背景下，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文艺理论界对文学与政治关系、人性、人道主义等问题展开批判性反思，逐渐摆脱政治的工具论、从属论、服务论的偏颇和束缚，“人”的意识开始复苏和觉醒，长期以来属于理论“禁区”的人性、人道主义、异化问题得到学界的广泛讨论，其中影响最大的文化事件是钱

① 雷达：《近30年中国文学的精神》，载《文艺研究》2008年第12期。

② 铁凝：《文学是灯》，载《人民文学》2009年第1期。

谷融先生 50 年代提出的“文学是人学”的重要命题得以重新确立。笔者认为，这是当时我国文艺理论最重要突破之一，是重新思考和认识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并应用于批判否定人性、人道主义的极“左”思想，正确总结、反思建国以来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的历史实践和经验教训所取得的重大进展^①。

90 年代以后，在市场化、商品化大潮的奔涌和冲击下，文学的世俗化、欲望化、娱乐化进程加速从边缘走向中心，而其内含的人文精神却日趋萎缩、匮乏和空虚。于是，引发了一场围绕文学和人文精神危机问题的大讨论。讨论主要涉及人文精神的理解、人文精神的种种危机征兆、人文精神重建的迫切性和具体途径、在重建人文精神的同时如何认识和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人文精神与终极关怀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讨论中尽管存在种种不同意见和分歧，包括对人文精神含义的不同理解，但总体上多数人基本上是将人文精神与人的生存及其价值联系起来考虑，或认为人文精神显示了人的终极价值，它是道德价值的基础和出发点，或认为人文精神主要指一种追求人生意义或价值的理性态度，换言之，主要还是从人、人的价值、人的精神追求等人学视角来思考和理解人文精神的，也是在人学这个层面主张重建文学中的人文精神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是否可以说，这场人文精神大讨论乃是 80 年代关于人性、人道主义问题讨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续和深化？可以作为笔者这一观点旁证的是，将这一讨论的积极成果运用于文艺理论建设而构建起来的新理性精神文论。钱中文等先生倡导的新理性精神文论的核心仍然在于按照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基本思路，把新人文精神视为自身的内涵和血肉，在大视野的历史唯物主义、进步的人道主义的观照下，弘扬人文精神，以新的人文精神充实人的精神，以批判的精神对抗人的生存的平庸与精神的堕落。

进入新世纪以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它不但深刻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内在统一关系以及人的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性，体现了党和国家发展战略的人本精神，而且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基本精神的自觉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目前，学界也开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出发，把以人为本作为文学艺术活动的出发点、落脚点和着眼点，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作为文学艺术的最终目标，亦即以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为指导，来思考、研究和建设当代的文艺理论。本文拟遵循这个思路，尝试就若干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① 详见朱立元：《从新时期到新世纪：“文学是人学”命题的再阐释》，载《探索与争鸣》2008 年第 9 期。

二

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对此学界存在不同意见,但是,诚如有的学者所说,强调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研究“一方面是为了回应西方学者对马克思哲学中所谓‘人学空场’的责难,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虽然关于‘人学’的名称和人学的学科定位,……其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但它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且有众多研究者参与其中的研究领域”^①。而且,就一种理论、学说研究的“问题域”或主要对象而言,人学已经构成了对于人、人性、人的本质、人的自由、人的个性、人的发展、人的权利和义务、人的品质和能力、人的文化一心理结构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专门研究的、相对独立的“问题域”。所以,“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的提法在理论上是能够成立的,在实际研究中具有显见的合法性。

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内容非常丰富、深刻,但其核心,在笔者看来,一言以蔽之,就是“以人为本”的理念。理由是,第一,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理论一开始就是从以人为本的思想出发的,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②,亦即以人为本的学说,从而推出社会革命就是为了彻底推翻压迫、奴役人的旧的社会关系,达到人和人类的彻底解放。第二,由此我们进一步看到,“以人为本”这一人学的核心理念还集中体现和展示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和愿景。《共产党宣言》明确把共产主义社会彻底解放全人类的最高理想和目标落实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上;马克思后期在论述人类社会发展经历的三种社会形态和与之相适应的人的发展三种状态时,更加明确地把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的人的发展定位为“个人全面发展”,他说,与最初的社会形态和第二大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第三大形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③。在此,马克思将共产主义社会的最根本标志归结为“个人全面发展”亦即人本身“自由个性”的发展。显而易见,在这个意义上,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核心仍然是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对“人”这个概念的理解。众所周知,

① 杨学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30年:回顾与反思》,载《光明日报》2009年1月20日“理论周刊”。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4页。

“人”一向是一个含义极为复杂多样的范畴，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理解，“人”的所指就有所不同。笔者认为，“以人为本”的人，可以从集体和个体两个层次加以理解：

首先，作为一个集体概念，它意指全人类。上面已经谈到，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为了解放全人类的理论，作为社会发展理想形态的共产主义就是人的普遍的全面的自由发展。这里的“人”是从全世界和全人类的共同命运着眼的。当前，在经济全球化、中国的社会发展日益融入世界发展的大格局中的趋势下，在我们面临各种过去不多见而今天却层出不穷的，超越阶级、阶层、民族、地域、国家等的，涉及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问题和矛盾时，党中央从宏观意义上重新提出以人为本的理念，并从全人类的理论视野来看待“人”，是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创造性继承与发展。这从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最近的一系列讲话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到。比如，胡锦涛同志在谈到奥运精神时就强调要“进一步弘扬人道主义精神，尊重和保障人权”，指出生态奥运的目的是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而人文奥运就是要“尊重和维护人类文明多样性和发展模式多样化致力于不同文明共同进步”^①。这里所有的“人”都是在“人类”整体或全体意义上使用的。这说明人类有超越阶级、阶层、民族、国家、地域、制度、信仰等等之上的共同需求、共同利益和共同特性。

其次，作为一个个体概念，它指每一个个体的人，是生存在“地球村”里的每一个个体生命。以人为本在这个意义上就是从个体角度关注人、人性，关注个体的生存境况，高扬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和珍视。这是在“人”的层面上对人类诸个体的价值认同，也是对人的关怀的深度层次，是上述马克思关于“个人全面发展”思想的基础和出发点，体现了时代思想的巨大进步。这种对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尊重、珍视和关爱，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举国上下和全世界不同地域、民族、国家、制度、信仰、职业的人们的无私救援行动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可以说是感天动地！胡锦涛同志也对此作了高度的肯定：“我们的人民坚持以人为本、尊重科学，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关爱生命、崇尚理性的民族品格。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先于一切、重于一切”，“在全国哀悼日里，13亿人共同为不幸遇难的同胞默哀，体现出全民族对人的生命的尊重”，“这种对生命的高度关爱，……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推动力”。^②这种对个体“人”的认同和个体生命的关爱，不但是全球化时代社会发展的重要维系之一，而且也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学

① 胡锦涛：《在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08年9月29日。

② 胡锦涛：《在全国抗震救灾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08年10月8日。

理论。

温家宝总理在英国剑桥大学的讲演中首次从以人为本角度概括我国30年来的改革开放,他深刻指出:“改革开放的实质,就是坚持以人为本,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在公正的条件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让国家政通人和,兴旺发达;就是维护人的尊严和自由,让每个人的智慧和力量得以迸发,成功地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①。”这里的“人”兼有集体和个体两重意义,而且对改革开放的实质从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人学理论的高度作了新的阐发,实际上与共产主义社会的最高目标也完全一致。

再次,以人为本的“人”,无论是集体的,还是个体的,都是指普遍、一般的人;因此,马克思主义人学承认人有普遍、一般的本质(性),即共同人性。这一点,长期以来在很大程度上被一些人有意无意地歪曲或遮蔽了,好像马克思主义只讲阶级性和阶级斗争,不讲人性、特别是共同人性。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严重误解。这种误解的实际后果是,新中国前面的将近30年,在“左”的路线支配下,人性论、人道主义不仅成为理论学术的禁区,而且成为政治上批判、禁锢、束缚、戕害广大人文知识分子的枷锁。实际上,马克思无论在早期还是后期,都明确肯定普遍、共同人性的存在。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通过对人与动物生命活动性质的根本区分的比较揭示出人的类本质或一般本质:“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而人的生命活动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②这里“人的类特性”就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般本质,马克思还强调指出这是人的“精神本质,他的人性”。人正是通过这种“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可见,这种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正是马克思心目中的普遍、共同的人性。马克思在其成熟著作《资本论》中,也明确指出:“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③他在论及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人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特点时还指出,“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这时候,“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④。这些都确凿无疑地证明了马克思一贯承认人存在普遍、一般的本质、本性即共同人性,而且是在以人为本(根本目的)的意义上,在描述共产主义理想蓝图的最高层次上加以论述的。笔者认为,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对于文学艺术

① 温家宝:《用发展的眼光看中国》,《文汇报》2009年2月4日第4版。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6页。

③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04页注63。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6-927页。

研究,尤为重要。

又次,与承认共同人性密切相关的是,在新世纪新的时代和社会环境下,“人性认同”的问题具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紧迫的意义。我很赞同有的学者的以下看法:人性认同不同于意识形态认同,它是对超阶级、超国家、超文化、超地域、超党派、超贫富的共同人性的认同,即对人的生命的尊重与珍视,是凡是人都可以认同的作为人而对人类同类生命的一种深切关切(如汶川大地震的举世大救援);它是人的类属性的最基本和最朴实的表达;人性中的这种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和珍视的自然倾向,是所有民族及其文化得以存在和延续的基础和源泉;由人性认同,对生命体的尊重和珍视,我们可以进而确认真善美的认同,确认有超阶级的共同的真善美,这是所有学科,包括伦理学、美学、哲学,应当承认、尊重和由此出发的基本事实^①。笔者认为,这种对共同人性的认同,不仅对于学术研究有重要理论意义,而且在当代世界和中国的现实语境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实践意义。当代中国处于世界性的全球化历史环境中,我们所面对的许多问题,已经大大超过阶级、阶层、国家、民族、地域、文化等等的范围,而带有全人类亦即“一般的人”的共同性。于是“人”的一般的、共同的问题,全人类的共同问题,逐渐凸现出来。比如人权问题就在全世界扩展,中国也越来越重视人权问题,越来越注意加强保护人权的法制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最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国别人权审查会议顺利通过中国人权报告就是明证;比如保持生态平衡一直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但是,中国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后续国家,这方面相对落后,生态的破坏、环境的污染十分严重,这方面的问题同样是全人类共同的利益所在;又如各种资源(当前特别是能源)也是人类在地球上共同生存的物质基础,中国地大人多物不博,资源匮乏十分突出,就全世界而言,资源枯竭问题也日益尖锐;再如社会公共生活领域中,也存在大量属于人类共同利益和需要的问题,像市场、消费、交通、治安等等,特别是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风暴席卷全球,是全世界所有国家、民族,不论地域、制度、种族、阶级、贫富、意识形态,都必须共同面对、同舟共济、合作解决的;更加重要的是,在精神文化领域,为了保证人类社会向更高的文明迈进,各国、各个民族都需要民主化、法制化的建设,并需要这种建设具有越来越多的共同性和可交流性,还需要适合于全社会遵守的公共道德的规范和建设;反腐倡廉成为全世界各国政府和政党的共同目标,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工商企业对诚信原则都有提倡和承诺;所有宗教对慈善事业的热心和日益向全社会拓展的趋势越来越明

^① 陆晓禾:《人性认同:发展健康的伦理学的基础》,载《社会科学报》2008年9月11日第5版。

显（2008年“股神”巴菲特将个人全部财产的百分之八十捐献给慈善事业）；近年来十分引人瞩目的是，世界各国都共同维护关乎人的生命、健康的药品、食品安全，我国从2008年对震惊中外的“三鹿奶粉事件”的及时处置，到2009年对两名新疆患者服用了假药“糖脂宁胶囊”而致死事件的迅速追查，都既表现了罪犯对“人性认同”原则的公然挑战，更显示了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对这一原则的坚决维护；如此等等。总之，在当代中国，这些情况、这个现实语境，都促使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成为现实的、紧迫的问题，也就使一般的人、人的一般本质（性）问题凸现出来，这一方面迫切需要寻求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人学理论给予回答，另一方面，也给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机遇。

三

回到当代文艺学建设上来。笔者认为，文艺学的核心问题是文学的本质和功能问题。这方面的研究，几十年来，我国几代学者作了极大的努力，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果，比如反映论、意识形态论、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等等，都有其合理性，在不同历史条件下都发挥过重要作用；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形成的审美意识形态论，得到了学界比较广泛的认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当然也有不同意见，至今仍在争论。在我看来，文学的本质、功能，本身乃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多层次多向度的课题，人们完全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不同侧面加以研究。而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可以提供一个对于文学艺术本质、功能不同于以上几种探讨的另一种研究视角，而且是更加贴近文学自身的研究视角。文学的本质、功能固然可以从反映、从意识形态等角度、层次去揭示，但是，反映只能是人的反映，意识形态也只能是人的意识形态，所以，从人、人学角度切入进去阐发，与上述这些角度、层次其实并不矛盾，反而可能更加贴近文学的本质、功能。惟其如此，在我国，1957年首先由钱谷融先生提出的“文学是人学”这个看似非常普通、平常的描述文学本质的命题，能够至今仍被普遍接受、深入人心，具有长久而不衰的生命力。下面，笔者试应用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人学理论从三方面对这个问题作概括论述。

首先，文学（文艺）活动作为人类审美活动和精神生活的重要形式，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和基本人生实践之一。我们应当把文艺活动提到人的存在方式的存在论高度来认识。

笔者认为，马克思的存在论首先把人与世界不是看成对立或主客二分的，而是融为一体的。马克思明确指出：“人并不是抽象地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